

西方记者非虚构写作中的中国城市书写研究

李娟

摘要:城市不仅是媒介化的产物,还是交往的进行时,这要求我们对于城市传播的研究重返其文化起点与“交流”的本质。文章择取当代有代表性的西方记者的中国城市书写,分析其文本如何描述和建构当代中国的城市主题,在历史与当下的话语交织中呈现着丰富的城市光谱。作者试图将“城市形象”从媒体话语与理论统摄中解放出来,投向具体的故事与讲述,在对现实生活的呈现与尊重中,关注全球化时代共同的城市话题:对人的观察、理解与关怀。

关键词:非虚构写作;城市书写;城市空间;城市记忆

作者简介:李娟,女,副研究员,文学博士。(浙江传媒学院 新闻与传播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6552 (2019) 03-0014-07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市化进程突飞猛进,作为国家基本的地域构成,城市在中国故事系统中作为空间场所与景观符号,首当其冲成为现代性撞击中迥异于西方城市的存在形态,进入西方人观察与描述中国的视野。近年来,西方媒体非虚构写作中的中国城市书写,形成跨文化叙事中的空间重构,为“中国形象”提供了背景与语调,影响着国际社会对“中国形象”的接受与塑造,也为我们研究城市传播提供了新的角度与思路。

城市书写及其传播已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在理论层面上,城市传播的基本理论构建一方面认同现代城市即是媒介,构筑了传播、交往、沟通的平台;同时,大众媒介构成的传播网络又独特地再现或重构了虚拟的城市系统;而在现代性框架中,现代城市空间的体验是融合性的,建筑物、物质空间、传播媒介、社会实践共同构筑了现代社会生活的传播、交往、沟通的过程。^[1]城市传播已成为当前城市研究的一支重要力量,为当前中国急剧发展的城市化进程提供了必要的理论面向。另一方面,在国际化的进程中,城市形象的对外传播对城市的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竞争力的提升有着直接的促进作用,影响到现有的研究为城市对外传播提供政策与实操参考型的论文占据半壁江山;^①也有部分研究具体考察了西方主流媒体的中国城市报道,以及外国人在媒体使用行为中的中国城市形象传播现状,^②该类研究大多注重报道倾向、数量、框架等问题的分析,一些理论命题被不断碰触,^③却出现了系统性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8年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研究课题“跨文化传播视野下西方记者的中国城市形象建构研究”(2018N93)的成果。

① 张恒军、张彦的《从城市形象建构到区域形象传播的理论探析》(《新闻界》2013年第21期),何国平的《城市形象传播:框架与策略》(《现代传播》2010年第8期),杨凯的《城市形象对外传播效果评估体系的建构》(《东南传播》2010年第8期)等论文在城市形象对外宣传的文化策略、大众传媒策略、人际传播策略、营销策略以及效果评估等实践议题上作出了论述,也代表了目前城市传播实操研究的主流。

② 参见赵永华、李璐的《北京城市形象国际传播中受众的媒体选择与使用行为研究——基于英语受众的调查分析》(《对外传播》2015年第1期),杨凯、李嘉琪等的《区域文化对外传播的问题与对策:基于国际媒体中广东文化形象的实证分析》(《对外传播》2014年第11期),欧亚、熊伟的《从〈纽约时报〉看北京城市形象的国际传播》(《对外传播》2016年第6期)等文献。

③ 如张恒军、张彦从媒介环境学的角度扼要论及了城市是由媒介塑造的传播体系,二者关系类似于媒介生态学当中的“共栖”关系,即人、媒介和社会各种力量共同生存,彼此影响。何国平在分析城市传播的文化策略时,也提出其基本理论依据在于城市形象元素与集体文化记忆的联系,文化构成了识别性符号与共识性话语,成为城市形象传播的叙述个性、叙事素材和叙事策略的资源库。

理论思考的缺席。

如何看待传播与城市在社会历史文化层面上的血肉联系，如何解析传播的各个面向，包括信息传递、公共交往与意义生成，如何在具体的文本中把握中、西方交流中的跨文化碰撞，而非止步于几组抽象而冰冷的关键词与数据分析，已成为当前中国城市传播研究中亟待深化的理论问题。体现在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的选择上，则要求我们突破已有的实证量化分析模式，暂时放下对宏观话语的偏爱，转而关注城市传播的“微”内容，将理论视线投向具体的交流活动，进一步探索其背后深层的文化与意义。从该理论考量出发，本文从媒介化城市的理论图景入手，取文本细读为路径，尝试在城市传播研究中引入跨文化视角，探讨生发于西方文化价值参照中的中国城市书写。本文将着力于非虚构写作，选取几位有代表性的西方记者^①关于中国的纪实叙事，从中勾连其城市书写，探索其话语和叙事交织建构的城市空间、城市记忆和城市故事。

一、城市空间：符号与文化

作为“人类社会权力和历史文化所形成的一种最大限度的汇聚体”，“城市就成为一种象征形式，象征着人类社会中种种关系的总和”，^[2]其首要体现便是空间。在芒福德的论述中，通过对空间的具体而形象的利用、控制，城市不仅负载着生产活动功能，还把某个历史文化和时代对于城市的基本态度保留下来，从而讲述着有关人类命运的各种不同观念和思想。^{[2][4]}这种经过文化调节的空间关系便进入了符号领域，成为传播发生的场所，也成为传播活动的构建之物。麦奎尔的“媒体—建筑复合体”概念也表达了类似的旨趣，在其描述中，“现代社会生活的空间体验经由建筑结构都与都市领地、社会实践和媒体反馈之间的错综复杂的相互构造过程而崛起。”^[3]

这也解释了来自西方文化里的讲述者在寻找中国故事时，何以首先对空间保持了高度的敏感与关注。作为符号化的空间，中国的城市群像系列，不仅体现于书名的选择上：如《江城》《寻路中国》（彼得·海斯勒）和《长乐路》（史明智），更在于具体的空间书写中不约而同地呈现着一定的时代特征和景观符号，如《再会，老北京》（迈克尔·迈尔）和《打工女孩：从乡村到城市的变动中国》（张彤禾）等。海斯勒在《寻路中国》中对“长城”景观的执着，已超出了旅行者的意趣，而是将之视为经典的中国意象，他选择了北京附近的三岔村作为自己的写作场所，融入当地村民的生活，近距离观察中国人，这里举步便可到达长城，向西是黄土高原，鄂尔多斯沙漠与河西走廊，“村民们都没有买车，也不用手机。没有餐馆，没有商店——想找个花钱的地方都没有。”^[4]

而“北京”作为中国最重要的政治文化空间符号，则反复被这些西方记者观察和记录，试图在这一内涵丰富的巨大空间中给出自己的解释，这零散地见于海斯勒在《寻路中国》的书写中，更集中地呈现于迈克尔·迈尔的《再会，老北京》。迈尔对于老北京及其相关的一切历史、文化有着强烈的兴趣，他租住在传统的四合院中，与“老寡妇”、“废品王”、朱老师等本地土著或外来务工人员相处，与片区派出所警官交往。长久深入的生活使他超越了刻板的外媒报道模式，展示着叙事本身的魅力：赋予这一被广泛政治化的空间冲突主题以丰富的生活细节。他追溯北京作为中国首都的现代化之路事实上从民国时期已经开始，更将北京城市改造放在世界历史的背景下，比较巴黎、雅典、阿姆斯特丹和纽约等城市在建设中的类似问题：历史与现代化的冲突。^[5]

^① 包括：彼得·海斯勒（Peter Hessler，前《纽约客》驻北京记者，《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国家地理》撰稿人），张彤禾（Lelie T. Chang，前《华尔街日报》驻北京记者，《纽约客》《国家地理》撰稿人），迈克尔·迈尔（Michael Meyer，《纽约时报》《时代周刊》《金融时报》《华尔街日报》撰稿人），史明智（Rob Schmitz），NPR（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上海站记者。选择这几位记者的理由，一方面基于他们在西方主流媒体长期写作中国报道，既涉及北京、上海、深圳等为西方读者熟悉的大城市，还广泛踏足了内陆以及东北地区等较少进入西方媒体视野的中国城市，产生了重要影响，另一方面是他们的重要稿件大多已集结成书，且在中国出版，得到了中国读者的广泛阅读与评论，从跨文化传播的视角来说，呈现出双向传播的面貌，具有典型的研究意义。

麦尔在西方记者喜爱的对老北京城生活方式的追慕之外，写出年轻北京人对整饬的现代北京生活方式的向往，还通过年轻学生和老人之口道出了情感与理性之间的纠葛：

“为什么老外都想拍这个穷地方的照片啊？”班上的学生大惑不解，“他们为什么不去紫禁城呢？他们是在笑话我们吗？”“我不想搬出去，”一位老太太接茬道。“房子不好，这个没错。但我住惯了。不过，外国友人来的时候，我就觉得丢脸了。看上去真是破破烂烂的。”^{[5](227)}

在展现现代中国城市空间与景观符号的复杂性时，这些以故事见长的西方记者没有忘记作为对立的另一极：中国乡村空间。有趣的是，在西方媒体中常见的“凋敝的农村”、被打压的农村之外，丰富的农村人物谱系、强大的“无孔不入”的生命力、中国农民特有的生活智慧得以在文字中展现。《江城》中固执地维护着教师尊严的廖老师，时刻想着挣钱的黄小强，对外国人细致有同情心的冯小琴令人印象深刻，打破了外媒城乡报道的对立模式，而在对于古村落是否应当现代化的问题上，麦尔在描述采访保护派的冯骥才时不无讽刺：

“我很好奇这些村长当时有什么感觉。也许他们也希望自己的乡镇能像这间办公室一样舒适暖和，乡亲们能住在水泥楼房中，而不是在木头和土坯房里，忍受着漏水、漏风、虫害和灰尘。然而，我不能打断面前侃侃而谈的冯骥才，因为他突然间看起来就如同周围的装潢和布置一样权威。”^{[5](293)}

在有关秩序、景观和权力结构的空間分析中，常见的二元对立式符号指代在此部分失效，生活的丰富层次在叙事中呈现。这源于鲜活、流动的跨文化交流本身，也体现了普罗瑟曾指出的，“一切文化传播同时也是人际传播”，^[6]而空间符号与关系的建构也必须以个体间的交往为基础，而非以符号的分析游戏为旨归，这一点在城市记忆书写中同样重要。

二、城市记忆：时间与情感

近年来，伴随着城市研究的兴盛，城市记忆作为其中的重要内容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对于其理论内涵也渐渐达至基本的差异性共识。在西方研究界中，城市记忆往往等于城市集体记忆，是一个特定社会群体成员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它既是一种物质客体和物质现实，又是一种附着于物质现实之上的、为群体共享的象征符号，高度浓缩了社会群体对城市历史、人物、场所、情境的记忆，兼具历时性和共时性。至此，“时间”概念在“空间”之外构成了城市形象的第二维度，且以后者为物质载体形塑了集体记忆与共同情感。

对于大多数来自西方尤其是美国的记者而言，“中国”这个空间符号带给他们的巨大冲击首先就来自厚重的历史和附着其上的记忆。且不论北京的记忆书写可以追溯至“天地初开之时”神话人物之间的战争或“古猿人”，近代的“明清皇城”，“四合院”与“老街”在西方的“他者”眼中已足以代表“历史”。

“也许中国历史太长了，所以这没什么大不了的。”一个女孩说道。

“哇！”一个男孩惊叹着，“我都不知道历史就在我们身边呢！”

“历史就是我们，笨蛋。”他的朋友漫不经心地回答。^{[5](96)}

当麦尔记录这段北京孩子们的对话时，他无疑道出了自己的内心感受。与之相关的，则是被西方媒体广泛关注的“现代”对于“传统”的强势话语，既反应在与空间有关的“拆迁”中，又体现在此空间转换过程中的“时间”焦虑：城市记忆能否以及如何被保存？

问题是，城市记忆的价值是否只在于以凝固的方式被保存？正如海斯勒在记录三峡大坝争议时写道的，“这不像在美国，某个空空如也、毫不起眼的晚清时期的战场遗址都可能会得到数百万美元的经费资助，仅仅是因为有些士兵在内战中战死于此。中国的历史如此丰富，如果要把所有的古迹都保护起来的话，人们恐怕连种庄稼的地方都没有了。”^{[4](119)}这里的进一步追问在于，对于记忆的书写和研

究，是否停步于符号化的建构便已足够？城市记忆对于居住于其中的人以及“外来者”究竟意味着什么？而书写与保存城市记忆的诉求本身又经历了怎样的合理化过程？

“成为现代的”——“留住传统的”之间的二元对立或者浅表层次的“并存”体现了现代性以来“记忆”概念的内在时间性冲突。在当代记忆理论中，这一冲突多以空间化和符号化的形式被处理，或借鉴社会学的建构思维，人类学的深描方式被抚平。大量对历史建筑、博物馆和城市地标建筑景观等的研究，多将之作为城市记忆的空间象征符号予以解码，主张纪念与保存；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民俗文化的研究，解析其作为形塑城市共同体的文化记忆；建构性理论则强调城市集体记忆受到社会群体的理想、信仰、制度、伦理和价值观等社会性要素的深刻影响，福柯的权力理论成为该种研究路数的资源，认为记忆是特定的政治经济的建构，如哈布瓦赫和康纳顿都谈到这一点，记忆服务于当下社会秩序的合法化，集体记忆是一种重构。^[7]

近些年，城市记忆在研究方法上从单一的定性描述逐渐走向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多种方法的综合运用，实地调查、问卷访谈、模型设计等手段日益流行。而无论采用何种研究理论和方法，保护城市记忆，珍视历史建筑、景观遗址以及具有传统地域特色的文化习俗和民风民情成为众望所归。现代性的冲突话语被技术化的思维加以“解决”，而不是被“理解”。但问题仍然有待解决：记忆为何重要？在何种意义上重要？

现实生活中的矛盾与冲突将成为我们思考城市记忆及其形象塑造的宝贵来源。身处中国现实中，脱掉西方当代媒体界“政治正确”的话语外衣之后，在生活本身的力量牵扯中，这些文本里自然流露的观察（而非定性）显示了城市记忆本身的多面。我们既能看到，“胡同之外的人们总将这里称为北京的‘贫民窟’，然而这里却并非疾病与‘问题行为’的滋生地……人们彼此之间礼貌相待，每当我来到胡同之外，就会深深想念这种人情味。”^{[5](189)}又能看到对于北京土著“老寡妇”来说，“她说她不会想念胡同里的那些老大妈们。‘跟她们说话没意思，’她坦率地说。‘我一般都是自己出去东遛遛西遛遛。’”^{[5](314)}同样，当一位外国记者对上海长乐路的高端公寓住宅区建造之前的历史感兴趣时，“他（房东）丝毫不以为意。‘就是一堆又破又旧的棚户区，’”^[8]在这里，“记忆”不再是某种正确的符号，而是回到了生活情境里的情感体验。

有意思的是，在时间的现代性二元对立模式下，无论是建国初年对“大烟囱”的进步向往（切除记忆），还是在21世纪后对“传统”的思慕（保存记忆），当代中国的城市记忆研究始终呈现“个体”的结构缺席。同时，在当代西方主流媒体有关中国城市记忆的书写中，两种记忆“叙事”的冲突仍然是首选的模式，而诉诸于差异与细节的“故事”往往被选择性无视。二者在本质上共享同一种冲突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城市记忆”是“地方的”或“排他的”，是“过去的”或“静止的”，等待被动的“保存—欣赏”，具有相对于“当代”的“落后性”或“优越性”，与尚未现代化之前的人情伦理相关。记忆成为选择，形象成为图像，博物馆或民俗展示舞台成为城市记忆的普遍诠释。

然而正如当代文化社会学家杰弗里·亚历山大指出的，虽然“集体意义”的概念广受重视，但“诠释集体意义并非这些文化的社会学家的主要关怀，更遑论关心个人或群体受意义支配的道德结构及其细腻的情感途径了。”他还谈到，“现实并不像前辈社会学家深信的那样透明和理性，”因为“支配这个世界的往往是主观的、内在的情感”^[9]如果说呈现于当代中国城市形象传播研究中的更多为符号的建构，那么这些西方记者的非虚构叙事于自身所在主流媒体的模式之外，写出了另一种流动的、多质的生活，为中国当代“城市记忆”书写提供了来自于情感与体验的注脚。时间与空间，文化与情感，符号与体验，这种种元素形成了多种声音汇聚的“城市故事”。

三、城市故事：话语与呢喃

20世纪70年代一批美英学者经过对媒体新闻室的参与观察，提出：对新闻施加决定性影响的，是

从业者身处的社会机构与组织环境、新闻生产的日常惯例与实践。在某种程度上，新闻是被生产出来的，而不是被发现的。^[10]塔奇曼、舒德森、甘斯等人在此领域的研究为该种认识奠定了社会学观察和民族志方法的基础，^①而荷兰学者迪克则提供了对新闻语言、结构、文本和话语类型的微观分析，同样揭示了新闻的“生产”本质。^[11]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新闻研究沿着该条道路，着重话语分析，建构话语模型，极大影响了当代中国学界对西方媒体报道中国的认识与研究，产生了相当可观的研究成果。^②同时，当代理论界深受福柯的理论洗礼，强调话语与权力的联系，将话语看成生产权力和建构秩序的巨大力量，这同样对新闻研究影响深远。这在一方面发掘了新闻作为社会建制的重要力量，但在另一方面却忽视了差异与细节。表现在研究对象上，是对西方主流媒体“news”的关注，却有意无意忽略其“story”的传统。

在此背景下，海斯勒、麦尔、史明智和张彤禾等人的努力值得重视。作为有着新闻专业主义训练的一批职业记者，他们在记录中国时避开了西方媒体室常规的新闻选题与话语操作，选择需要长期浸润于所在地的非虚构叙事，努力克服语言困难，尽可能隐藏作者，让生活自身的真实质感浮于文字中。这成为一种自觉的写作追求，正如海斯勒本人谈到的，“传统美国新闻训练会束缚人。驻外通讯员到了国外，会像在本国做新闻一样，去寻找他国的一些极端的事情，去看看有哪些地方需要改进。”然而在跨文化的写作中，如果缺乏足够的背景知识，西方记者依旧寻找当地极端例子来报道的话，会让美国读者对中国的实际情况产生错觉，“最后的结果是什么问题都无法解决。”^[12]在各种“话语”喧嚣于当代媒体界和学术界之时，让个体的“呢喃”发出声音，给人以强烈的在场感。与中国城市相关的种种空间符号与记忆元素不再是被媒体操纵的“话语”，而是成为背景和元素，共同书写出基于个人生活流动与生命体验的“城市故事”。

该种特质在史明智的《长乐路》中得到了鲜明的呈现。“长乐路”本身有着强烈的时空符号属性：地处原法租界，解放后以福建的某个城市更名，路边植满伦敦悬铃木，而本地人称之为“法国梧桐”。正如作者写道的，原法租界是一块意义丰富、烙有浓重的中国近现代历史痕迹的区域。它源于鸦片战争失败后法国殖民者的划区而治，成为中国近代史屈辱的见证，同时，它在太平天国起义时庇护流落的农民，在日军侵华期间保护本地居民，更有甚者，1921年时毛泽东也正是在此处躲过当局的追捕与同志会面，并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它经历建国后的社会主义改造，见证时代的风起云涌。然而史明智并不打算在这本书中开发重大主题，相反，在一处有着深厚历史背景的所在，他将笔触伸向生活在这条小路上一户又一户的普通人家：卖煎饼的冯叔傅姨夫妇，三明治店店主CK，开花店的赵女士，以非法集资为目的的地下教会等等，在回忆的穿插中跨越中国当代历史。

一个个小故事成为《长乐路》的核心所在，这使其虽遵循新闻写作真实性的要求，却有着强烈的文学特质，让人联想起同样以非虚构写作见长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奈保尔的小说《米格尔街》。对生活语言的尊重，不同人物个性的展示，作者视角的隐藏和道德中立等等，使得《长乐路》虽只写上海的一条小路上的人间悲喜剧，其人物与故事的真实质感却带来了超越时空的共通性。因为户籍导致大儿子无法参加本地高考的赵女士，还面临着小儿子的留守问题，教育的失败之后是娶媳妇的种种绝望与努力，在看似无解的命运循环中是母亲对儿子永不放弃的爱。CK自小便反抗父亲的权威与“体制”代表的一切，成为有高度生活选择权的上海移民，然而曾经遭受历史重创的奶奶仍在他的生活中发出无声的声音，让他在一种“古怪”的预感中阻止了她的自杀，“两人一同瘫倒在床上，孙子抱着奶奶，在这个祖孙多年前共用的安静房间里。”^{[8] (278)}而在CK的幼时，他也曾躺在熟睡的奶奶身旁尝试割腕自

① 包括《什么在决定新闻》（赫伯特·甘斯）、《做新闻》（盖伊·塔奇曼）和《发掘新闻》（迈克尔·舒德森）等。

② 如刘立华、毛浩然的《话语分析视域下西方媒体中的当代中国故事——以〈纽约时报〉为例》（《当代传播》2011年第5期），陈俊、王蕾的《〈纽约时报〉涉华环境报道的批评性话语分析》（《编辑之友》2011年第8期），陈岳芬、黄启昕的《遮蔽抑或凸显：话语分析下的“乌坎事件”——中西媒体新闻报道比较研究》（《新闻大学》2013年第21期）等。

杀，却因对家人的留恋而停止。与CK终生不和的年迈父亲在儿子和自己说话时已毫无反应，

“这种无声的反馈，与CK记忆中童年的情形大相径庭。那时的他会耐心地听父亲痛斥体制。如今，父亲成了眼前这幅喃喃自语的空壳。CK坦言，他不知道这两者哪种更糟。”^{[8] (279)}

此时，所有空洞的时空符号退居其后，故事来到幕前，生命的流逝与成长成为共同而永恒的体验。

张彤禾的《打工女孩》则是来自女性作者的另一种尝试：身处广东，在东莞这一经常被西方媒体关注的务工城市里，跳脱出关于中国打工群体的叙事框架，关注“打工女孩”的生活和心灵世界，书写她们的成长。与前几位记者的旁观者立场不同的是，张彤禾在此书中注入了自己的情感、困惑与共鸣。与其说她写的是打工者，不如说是离乡者的生活。“跟我最亲近的姑娘身上有一些共同点：她们理解她们生活的戏剧性，也知道我为什么想要了解她们。我想她们对我的理解比我想象的更多，我来自美国，上过大学，论教育程度和社会阶层，我和她们相隔十万八千里。但是作为这座城市里的一个单身女人，我知道孤独是种什么滋味……我也有交不交男友的两难抉择，也有父母担心我还是单身……”^[13]张彤禾反复提及一句话，“我和你们一样”。

尽管张彤禾笔下的春明遭遇过种种困境，但并没有作为受害者，或是被时代浪潮裹挟着的被动角色来刻画，相反，作者发现了她身上顽强的生命力。“这些打工女孩从未找过我帮忙，极少寻求我的建议。她们独自面对生活，就像我们刚认识的那条她们告诉我的话。我只能靠自己。”^{[13] (338)}作为美国华人移民的后代，这种移居生活背后的艰辛与激情，在跨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中引起了她的共鸣，这无疑是全球城市化浪潮中共同的主题。

四、结语：从媒介城市到交往城市

在传播学理论中，城市是通过媒介化行为形成的，其形象可视为象征性系统的具体化实现，李普曼的“拟态环境”说为之提供了理论基础。在李普曼看来，大众媒介在叙事、议程设置、语调和视角的选择中熔聚了他人的形象，在表面客观中立的讲述中，阐释流动于期间，暗含着作者的价值取向或机构的利益驱动，从而为我们建构了一个区别于真实世界的虚拟现实。它严重影响甚至决定了我们的认知，以至于“多数情况下我们并不是先理解后定义，而是先定义后理解。置身于庞杂喧闹的外部世界，我们一眼就能认出早已为我们定义好的自己的文化，而我们也倾向于按照我们的文化所给定的、我们所熟悉的方式去理解。”^[14]

“文化”作为深层的结构力量在李普曼的媒介分析中已有所显示，而其后的传播学研究则更着力于李普曼对于新闻媒介的操控性机制的发现，这也引发了詹姆斯·凯瑞对于传播研究“传递观”的反思，“在我们思想的最深处，对传播的基本理解仍定位于‘传递’这一观念：传播是一个讯息得以在空间传递和发布的过程，以达到对距离和人的控制。”^[15]这在相当程度上解释了当前的城市形象传播研究何以重实证和操作，表现出较强的行政性和权力取向，对宣传与效果的强调成为主流。另一方面，无论是西方主流媒体的中国城市报道，抑或是以之为对象的研究，不约而同地倾向于割裂传播面向的诸多层次，关注数据、关键词与模式，忽视情感、意义与交流的维度，将丰富的交往实践从文化场域中剥离出来，塞进话语的框架，完成既定的阐释模式。

然而正如这些文本所展示的，现代城市不仅仅只是媒介化的结果，还意味着建筑、景观、记忆与情感的交织与互为，是一代又一代跨文化交流的时空积淀，是人与人之间交往的进行时。中国的现代城市形象，在历史与当下的话语叙事中呈现着丰富的光谱。海斯勒、麦尔、史明智和张彤禾等西方记者在记录中国时，不约而同地抓取了城市主题，努力打破西方媒体的刻板印象，让普通中国人的生活世界与情感世界在故事中汇聚。在他们的文字中，充满了鲜活的中国人与西方人彼此间的注视、交流与理解，在想象性误解中走近彼此。城市形象不再只是某几座地标建筑和新奇景观，也不再是民俗博物馆里静止的陈列物，相反，它是日常的交谈，是讲述与聆听，是彼此间迥然不同却又可以互相询问的

生活方式，是文明的碰撞。在当代令人不安的孤立主义与民族主义思潮甚嚣尘上的现实世界中，这些文字让人看到不同文明与文化之间相互接近的可能，而这种可能就是现代城市的本质，它应该也可以成为现代人共同生活的家园。

城市是文化的生成物，又反哺着文化的发展与延续，无论是城市书写抑或城市研究始终不能搁置对“人”的观察与关怀。城市空间、城市记忆之所以是有意义的，不仅仅在于提供了有价值的理论生长空间，更在于它们事关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或发生在街道、公园的公共空间，或悄声隐匿在私密的个人空间。故事在其中生根生长，人的情感、认知、欲望与理性合奏出与现代文明伴随而来的革新与病痛。在全球化时代，城市即为跨文化，巴别塔不在高空，而在人间，在一座座光辉或璀璨的现代城市之中。当简·雅各布斯以记者捕捉生活的敏锐眼光批判柯布西耶的城市规划理论对日常生活的革除，^[16]当扬·盖尔以建筑师的细致告诉我们穿过街坊邻里走到停车区域与开车直接驶入私家车库的不同，^[17]他们都在强调现代城市的交流性本质，而不再仅仅是媒介的话语建构。正如雅各布斯所言，现代城市文明的价值就在于让生活方式更加复杂，正如这些反模式的西方记者试图向读者呈现的中国城市故事的复杂性。也正是在这种城市书写中，出现了张彤禾这段颇具跨文化意味的思考，它道出了现代性流动生活中共同的城市主题，无论中、西：

“几乎我在东莞认识的每个人都是奋斗者。可以说，这是自我选择的结果：一个有雄心的人会更愿意接受新事物，这其中也包括跟我交谈。我不能说敏和春明是中国广大农民工的典型代表。她们只是我碰巧写到、关注，并且最为了解的两位年轻女性。但她们生活和奋斗象征着她们祖国的今天。最终，跨越了时间和社会阶层，这就是中国的故事：离开家，吃苦受累，创造新生活。在她们这么做的过程中，要应付许多艰巨的困难，但也许，这些挑战相比一个世纪前新到美洲大陆的人所面临的，并不会更可怕。”^{[13] (323)}

参考文献：

- [1] 孙玮. 传播视野中的中国城市研究 [J]. 杭州师范大学学报, 2013 (2).
- [2] [美] 刘易斯·芒福德. 城市文化 [M]. 宋俊岭, 李翔宁, 周鸣浩译.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9: 1.
- [3] [澳] 斯科特·麦奎尔. 媒体城市: 媒体、建筑与都市空间 [M]. 邵文实译.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2013: 1.
- [4] [美] 彼得·海斯勒. 寻路中国 [M]. 李雪顺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1: 121.
- [5] [美] 迈克尔·麦尔. 再会, 老北京 [M]. 何雨伽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3: 135.
- [6] [美] 迈克尔·H. 普罗瑟. 文化对话 [M]. 何道宽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56.
- [7] [英] 保罗·康纳顿. 社会如何记忆 [M]. 纳日碧力戈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0: 4.
- [8] [美] 史明智. 长乐路 [M]. 王笑月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8: 21.
- [9] [美] 杰弗里·亚历山大. 社会生活的意义——一种文化社会学的视角 [M]. 周怡等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3.
- [10] 李红涛. 黄金十年的“十字路口”: 《生产新闻》与新闻生产社会学的崛起 [J]. 中国传媒报告, 2013: 4.
- [11] [荷兰] 梵·迪克. 作为话语的新闻 [M]. 曾庆香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3.
- [12] 黄悦. 《纽约客》如何报道中国?“到内陆去, 避免过于政治化” [EB/OL]. www.thepaper.cn, 2015-12-12.
- [13] [美] 张彤禾. 打工女孩 [M]. 张坤, 吴怡瑶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3: 27.
- [14] [美] 沃尔特·李普曼. 公众舆论 [M]. 阎克文, 江红译. 上海: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6: 62.
- [15] [美] 詹姆斯·W. 凯瑞. 作为文化的传播: “媒介与社会”论文集 [M]. 丁未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5: 5.
- [16] [加] 简·雅各布斯. 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 [M]. 金衡山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6.
- [17] [丹麦] 扬·盖尔. 交往与空间 [M]. 何人可译.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2: 130.